

汪琪 台灣第一位傳播學女博士

※本文引自《提燈照路的人：政大新聞系 75 年典範人物》（2010 年）

【楊倩蓉報導】她是台灣第一位拿到傳播學位的女博士，也是政大新聞系第三十一屆的系友。

能文能武的汪琪老師，在學術上的非凡成就，讓她長年在世界各地講學；她在經營管理上也極有長才，曾擔任《光華雜誌》總編輯，更歷任政大新聞系主任及所長、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更以講座教授被母校回聘。



總是帶著滿臉笑容的汪琪老師，早年在政大新聞系念書時便是有名的才女，關於這一點，汪琪老師笑著解釋：「那都是一場誤會，因為我去過非洲，會講一點法文，也會講一點廣東話，在那個年代大家覺得很稀奇，所以就覺得我跟別人不一樣。」

汪琪老師很少談到她的背景，很多人只知道她出身外交世家；其實，翻開近代中國外交史，清廷駐日欽使汪鳳瀛，北洋政府駐日公使汪榮寶，分別都是她的曾祖父與祖父，她的父親汪公紀也曾經擔任駐日代表團的副團長，一家三代都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留名。

在這樣特殊背景下長大，的確讓汪琪老師童年的經驗特別與眾不同。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她在巴黎出生，三歲才來到台灣；初中二年級時，父親派駐馬達加斯加擔任大使，所以再度舉家遷移，她的少女歲月，有三年時間是在馬達加斯加島上度過。

「第一年我很慘的，因為我剛從台灣過去，還不會法文，只好待在家裡補習，很孤單；我的老師又很兇，只要弄錯文法他就會扯我的頭髮。」汪琪說。當時華僑之間也是以廣東話溝通，汪琪度過了封閉的十五歲，直到隔年進入當地天主教辦的法國學校，交了朋友，法語也開始流利了。「不過，十七歲生日

舞會沒多久就離開了馬達加斯加島，再度回到台灣，我的法語現在已經沒辦法講了，看報紙還可以。」汪琪笑著說。

除了外在環境因素，汪琪也深受家庭影響，她說：「我的父母都是正統華人血統，但是我的文化部分倒是有一點雜。」她的父母成長背景跟她一樣特殊，由於祖父汪榮寶在民國初年曾經擔任駐比利時與瑞士公使，她的父親是在瑞士念的小學，後來因為祖父又被派到日本，所以她的父親是早稻田大學畢業；而她的外祖父也是派駐日本的外交官，所以母親從小就住在日本，畢業於日本神戶女學院英文系。

也因此，汪琪的父母親跟傳統中國父母對待子女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我的父母親都會用 sweet talk 的方式跟我們小孩說話，有別於傳統中國父母。」汪琪說，尤其是她的父親，會帶她去探索知識、世界影響她極深。

「小時候一個簡單的問題，他會翻出百科全書找出許許多多和作業相關的資料出來。有時候我很著急，因為弄了半天什麼都說了，答案該是什麼卻還是不清楚。現在想想我父還是有道理的；很多事情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她也回憶，小時候父親帶她去爬山，走走就說他迷路了，這時候汪琪就會很神勇的帶他去找回家的路。

回顧早年的童年歲月，汪琪說：「我人生的一些決定與學術上的追求可能都和父親的教育有些關連。」

面對人生：我很隨性，夢想很多

的確，在人生的決定上，因為父母採開放自由的態度，汪琪說：「我很隨性，夢想很多。」

高中時，她看了很多《大公報》創辦人張季鸞的資料，大學聯考第一志願便決定念政大新聞系，大學畢業後她進入《聯合報》實習，因為很景仰政大政治系一位名教授的學術風範，於是打算進入政治研究所念碩士。汪琪笑著說：「結果我還真的沒考上，連成績單都沒拿到，到現在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幾分？」

當時她跟班上其他兩位同學都獲得《聯合報》留任，被視為是一個榮譽，但是汪琪說，她還想多念一點書，既然沒考上政治研究所，她就申請到康乃爾大學讀碩士去了。

1972年，在康乃爾拿到碩士學位後，汪琪曾經在報界聞人、同時也曾任教政大新聞系張任飛所創辦的《綜合月刊》工作一年，後來再度返美到南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1977年剛拿到博士學位時，當時張任飛有意模仿美國《TIME》雜誌風格，在台另創一本刊物，因為欣賞汪琪的能力，希望由她來創辦。

接下這份艱鉅的任務後，汪琪主動申請進入《TIME》雜誌見習半年，希望深入了解《TIME》雜誌的經營方式；當時她除了跟訪採訪記者，也輪調不同部門實習，從編輯作業到業務經營，這段獨特的經歷，無形中也讓她對新聞編採與行政經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雖然，辦雜誌的任務後來因為資金調度問題無法實現，但是這段在《TIME》雜誌見習的經歷後來卻在擔任《光華雜誌》雜誌總編輯時，派上了用場。1984年已經在政大任教的汪琪臨時被當時新聞局長張京育邀請到《光華雜誌》兼任總編輯，處事溫和幽默的汪琪，在經營管理上卻極有長才，她參考《TIME》雜誌風格，全力改版，每月策劃封面故事進行深入報導，精采圖片一定放大，更按照記者興趣重新規畫採訪路線，且引進查證制度，力求報導真實性，一新《光華雜誌》風貌。

能文能武的汪琪，即使不走學術這條路，也能在媒體圈一展長才，但是彷彿命中註定，即使幾次出走到媒體界，終究還是回到學術圈來。1979年原本在《聯合報》專欄組擔任副主任的她，偶然間獲知夏威夷東西文化交流中心徵聘研究員一職，經錄取後，她便辭掉報社工作到夏威夷擔任研究員，三年後返台正式進入母校政大新聞系任教。

1987年汪琪接掌政大新聞系系主任及所長時，推行了一項很重要的制度，設立委員會，由教授治系。談起當年這項革新，汪琪說，在她接任系所主管前一年，正好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看到中大有些作法不錯，決定借鏡參考；兼之當時社會開始有「教授治校」的口號喊出，讓她決定從教授治系開始做起，成立教學、研究、學生事務三小組，由系所教授自由選擇，參加一組或多組，任期一年，系所事務先透過委員會討論，再送到系務會議上表決，為校園民主化邁向了第一步。

汪琪說：「以前招募老師就是由系所主管拍板定案即可，沒有透過招募或是試教方式。」教授治系的好處也是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好的師資與課程。

面對學術：反對企業化經營，堅持學術自由

汪琪說，童年時候她患有氣喘，父母只求她身體健康，不敢對她有任何壓力與期待，所以在人生的方向上，她向來依照自己的興趣前進。而在學術的追求上，父親給她的教育就是自己找答案，堅持不隨波逐流。

她的學術成就多年來屢有傑出貢獻，民國 85 年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多年來也相繼在國外出版英文著作五本，中文著作四本，更屢此受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例如 2000 年曾被邀請參加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在新加坡年會的主題演講；2009 年，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在芝加哥年會有關網路政策的全會研討會演講。她更受邀回母校南伊利諾大學傳播學院，為他們的媒體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開幕作主題演講。

2009 年，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資訊學院」曾經邀請汪琪擔任客座教授，這是該傳播學院首度邀請第一位來自亞洲的女性傳播學者來此授課，也是「黃金輝講座」的第一位亞洲學者，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創始院長兼教授郭振羽十分欽佩汪琪的學術成就，他說：「汪琪老師是目前台灣傳播學界在國際學術圈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學者，她的研究領域比較尖端，像是媒體全球化與電訊傳播等，她很早就在國際上用英文發表著作，她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這些有目共睹的成績也讓她開始擔任更多重責大任。1996 年，她出任中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2001 年她剛到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擔任講座教授時，香港浸會大學便力邀她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兼院長。

2007 年，在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四年任期後，汪琪老師毅然辭掉這份大家眼中既有名望又享有高薪的職務，返回政大擔任講座教授。汪琪說，辭職原因有很多，她離開浸會時跟校長說，她在台灣做過系主任也做過院長，不僅可以同時開兩到三門課一學期，也可以同時進行國科會研究計畫，甚至還有餘力可以承擔有線電視修法小組的工作；但是在浸會大學擔任院長這四年，她只開過一學期一門課，其餘時間每天耗十二小時到十四小時作行政工作，她的研究計劃已經耽擱了四年，心裡焦急如焚，更重要的是，她發現香港高等教育採用企業化經營的結果，讓她看到很大的危機。

「我是非常反對用企業化管理理念來經營高等教育，非常反對。」汪琪嚴肅地說。她指出，香港政府並非直接將高等教育所需經費撥款到各公立大學，而是撥款到一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 UGC），由企業界領袖與社會賢達主其事，負責將經費作最有效的運用，再由香港八所公立大學去爭取教育經費。

原本不用自行籌款的公立大學款，改由必須自己籌款部分經費，「那個影響很大，」汪琪搖搖頭說：「我在當院長時無論是寫計畫書或是應付各種評鑑，想的都是市場，表現指標，這些企業界用的名詞與概念，現在全都用在教育上。」

為了爭取經費，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無不絞盡腦汁向企業籌款。她看到企業主如何將企業經營的思維與遊戲在大學裡發揮得淋漓盡致，她就感到痛心異常，她記得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曾經說過一句話：「大學是一個社會裡最後一個具有理想性的社群。」但是，籌款機制卻硬生生將這個理想性社群打破了。

汪琪說，UGC 委員用企業化方式設立很多指標來衡量香港公立大學的產出，「你的產出是甚麼？你有義務去交代，如果經費撥給你卻沒有得到相對的成果，下一次我就不會給你這麼多錢。」這是香港公立大學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問題是，企業經營成不成功，看利潤即可；那麼該拿甚麼去衡量一個大學辦得成不成功？有甚麼產出呢？結論是設立各種指標，包括畢業生的就業率，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等；汪琪說，這些指標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合理的地方在於可以看出學校培養的人才是否跟社會需要的人才有所落差。「但是不合理的地方，像是哲學系或是音樂系的畢業生怎麼辦？藝術家或是文學家要如何計算？那學校還要不要培養這些人？因為他們會拉低其他畢業生的就業率與起薪，導致學校無法拿到經費。」汪琪痛心地说，結果導致這些冷門科系不是被關掉就是被合併。

汪琪看到的另一個危機，那就是現在高等教育的研究論文產出也設立了一個標準，她指出：「『社會科學文獻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SCI）成為衡量學術成就的唯一標準。」

「SSCI 導致大家的研究取向完全以國際一級期刊編輯的喜好為喜好，」汪琪指出學術研究應該是我們社會需要怎樣的研究，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遞到適合的期刊上發表；但是現在卻變成先去研究這些 SSCI 期刊對甚麼樣的議題有興趣，然後再決定你要寫甚麼東西，「你只能登 SSCI 要的東西，那我們自己的歷史與文學還有人要研究嗎？別人看不懂也沒興趣。」

為了讓下一代警覺到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汪琪放下了多年來媒體全球化的研究，這幾年都在作本土化的研究，涵蓋範圍從社會科學到人文，從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去尋找，希望找出屬於華人自己的論述。

「那我們自己的論述又是甚麼呢？」汪琪問。2008年，由她主編「社會科學概念：中西對話系列」，首批出版的兩本書《二元對立與陰陽：世界觀的衝突與調和》與《民意與輿論：解構與反思》，深度解析西方的「二元對立」和中國的「陰陽」；比較西方的「民意」和中國的「輿論」，希望讓讀者在此一議題上，看到中西文化的異同。

「我們這一代的研究人員一直過著人格分裂的日子，」汪琪說：「你在生活的時候是華人，作專業研究時必須要把自己變成西方人。」她指著擺在桌上的《民意與輿論：解構與反思》這本書說：「我希望以後的學生或是年輕學者在他們接觸到西方概念時也能了解，其實我們的傳統裡面也有類似的關懷，也曾討論過類似的議題，不是只有西方那一套可以拿來作為我們做研究的素材，不是只有西方的才有價值，我希望打破這個界線。」

為了全心投入，2010年初，在校長極力挽留與新聞系師生極度惋惜下，汪琪堅持申請退休。她說：「我需要脫離學術圈，才能專心做這件事。」

面對家庭：agree to disagree，容許對方發展的空間

或許是因為出身外交世家，加上不凡的學經歷讓汪琪在看事情時，總是有著多元與獨特的看法，不過，很多人也好奇，汪琪老師與另一半彭家發老師，是政大新聞系有名的教授夫妻檔，這對夫妻從當年念政大新聞系同班同學開始交往，既是同學，更是同行；私底下的汪琪老師，與彭家發老師究竟是一對怎樣的夫妻呢？

聽到原來大家這麼好奇，汪琪老師哈哈大笑，她側頭想了想，微笑說：「基本上，我跟彭老師兩個人是兩條平行線，興趣完全不一樣。」

一家三口，汪琪笑說她是夢想很多又隨性的人，彭老師跟女兒則是比較實際的人。兩人生長背景截然不同，一位是外交世家背景，從小習慣接受多元文化；一位是傳統華人家庭長大，習於傳統文化。

汪琪說，彭老師喜歡唱廣東大戲，非常愛看功夫片，但是她不一樣，她喜歡古典音樂歌劇，有一次在澳洲雪梨，她排隊買票看《歌劇魅影》，看完第一遍第二天又再買票再看一次，「這在彭老師看來是完全瘋狂的事。」汪琪笑著回憶，她還提到有一年她在紐西蘭買了一個農場，興致勃勃開車帶彭老師去看，「結果，彭老師一下車左看右看都看不到一個人，說了一句『神經!』就回頭上車走了，你可以看出兩人差別有多大。」

但是因為兩人既是同學又是同行，生活圈的重疊度非常大，生活型態都是教書做研究，拜訪老師也是彼此的老師，所以平日相處都很有話聊。雖然個性不同，汪琪說：「不過可以 agree to disagree，容許對方發展的空間，所以可以和平相處。」

結縈三十多年，汪琪說，因為工作的緣故，有時她在夏威夷工作，正好彭老師就派駐香港；又或者好不容易她回政大教書，結果彭老師又去了香港，他們夫妻倆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沒有住在同一個地方，連女兒也在美國念書與工作，她說：「我們一家三口不在同一個地方很正常。」

雖然多年來常常分隔兩地，汪琪說，彭老師有一個持之以恆的習慣，就是打電話與寫信都非常勤快。「早年我在夏威夷工作三年，那時候還沒有電子郵件，彭老師每三天一封信，每周一次電話，從來沒有斷過，現在也是一樣。」這是他們夫妻維繫感情的方式。

即將在 2010 七月底卸下教書重擔，退而不休的汪琪老師還有很多夢想等著去實踐，尤其是致力於將華人文化透過學術研究，讓更多人接受。

「這是一個混沌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她想告訴現在新聞系學生的話：「當生涯不再有固定軌道給你選擇時，就是各路英雄出頭的時候。」但是如何作好準備？她說，路不要愈走愈窄，應該愈走愈寬，做好紮實的基礎訓練很重要，「語文、藝術與歷史都是基礎的東西，再加上現在有那麼多新的工具，能不能發展出新的東西，就要看年輕人囉！」

【小檔案】汪琪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學院博士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學士（31 屆）

民國 71 年 起聘

民國 76 年 - 民國 80 年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主任

民國 99 年 退休



提燈照路的人，記錄新聞教育的典範人物，民國 99 年出版。